

文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三十辑

十年京兆（一）.....张友渔

翁文灏诗体回忆录：洄溯吟

我的父亲徐谦.....徐 英

我的邮票设计生涯.....孙传哲

一九四二年初在昆明

采访宋美龄杂忆.....殷 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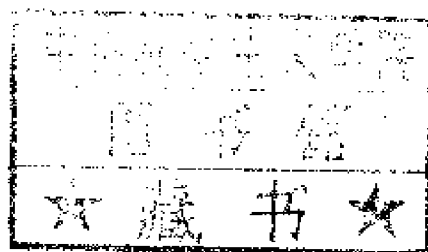
京华琐话·过年点滴.....刘叶秋

北京出版社

66742

文史资料选编

第三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Wenshi Ziliao Xuanbian
第三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89,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00

书号: 11071·504 定价: 1.60元

十年京兆（一）.....张友渔（1）

翁文灏诗体回忆录：洄溯吟.....（63）

孙中山先生二三事.....萧伯荣（97）

孙中山先生赠先父“博爱”横幅

.....韩安荆 韩安州（100）

记刘禹生所谈中山先生故乡见闻李克非（103）

国共合作的光辉范例

——追述孙中山先生支持创办上海大学.....刘永平（107）

孙中山先生伦敦脱险

——发生在清驻英使馆内的一场纷争.....柏功扬（111）

记我国近代教育家爱国老人马相伯马一民（117）

回忆马相伯先生的爱国言行刘永平（127）

忆父亲马寅初二三事.....马本寅（133）

马寅初先生在重庆被捕后的一次讲话

.....刘成郁（143）

我的父亲 徐谦.....徐 英（147）

徐谦年谱.....	周祖羲(158)
先君覃振 事略.....	覃 钰(175)
我作李济深先生的家庭医师	谭守仁(182)
我所知道的于右任先生.....	刘永平(194)
我与于右任先生的相识.....	赵 新(200)
我的邮票设计生涯	孙传哲(203)
抗战时期国民党派系在西南公路上的 权利争夺	苏从周(219)
一九四二年初在昆明采访宋美龄杂忆	殷 达(228)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与杨崇瑞校长	傅 惠(232)
回忆北京第一卫生 事 务所.....	宋叔容(245)
朝拜妙峰山娘娘顶杂记.....	修 明(249)
妙 峰 山三题.....	石际等(251)
京华琐话·过 年点滴.....	刘叶秋(262)
一条龙羊 肉 馆.....	王永斌(265)

十 年 京 兆

(一)

张友渔

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在北京市任市政府的常务副市长。这十年，是北京市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城市转变为社会主义新城市开头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北京市经历了过渡时期，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恢复时期，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时期，农业、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时期。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北京市全体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奋斗，北京这个世界闻名的古都，迅速地改变了面貌，由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被践踏得满目疮痍、破烂不堪的烂摊子，转变成为一个社会秩序安定，经济文化繁荣，人民群众精神面貌日趋高尚的社会主义新城市。解放初期，北京除了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等极少数规模较大的工厂外，只有一些酿酒、染织、针织、面粉、地毯、铁工等工业，规模小而且分散。经过短短的十年，这个长时期的消费城市，已经办起了许多规模宏大、拥有相当先进生产技术设备的大工业，变成了基础相当雄厚、门类相当齐全的生产城市。虽然我们在工作中也有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整个北京市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首先是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胜利，也是全体北京

市干部和人民群众辛勤工作和劳动的胜利。当然，这些成绩的获得，也是与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对北京的关怀和无私的支援分不开的。

在这期间，我做为市政府负责常务的副市长，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四年以后为国务院）、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下，与北京市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工作了三千多个日日夜夜，许多人和事，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愿把这十年的经历，主要就个人在工作中所接触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我所处理过的一些问题，联系当时整个工作的背景，侧重于解放后的头几年，做一简略的回顾。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对研究北京这段历史的同志，和探索今后继续前进道路的同志，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

一、新的使命

一九四八年底，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华北的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当时，有一份由我起草的华北局发给华北所属各地区的电报，扼要地记载了当时的形势。我手边保存的这份电报原稿是这样写的：

“我华北人民解放军以风驰电掣之势，驰骋冀热察绥之间，屡歼蒋军，迭克各城，已使蒋军疲于奔命，穷于应付。而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则乘解放沈锦，扫清辽南之余威，雄师百万，进军关内，声势浩大，先声夺人，军行所至，势如破竹。蒋军望风披靡，弃甲曳兵而走。榆关、秦皇岛、唐山等要地，不战而下，冀东区已尽在我掌握之中。……”

华北全境之解放，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不久，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与我华北人民解放军会师并开始联合作战。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淮海战役打响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和华北人民解放军共同发起平津战役。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一月三十一日，北平二十五万敌军，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宣布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当天，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北平发行。二月二十一日，华北人民政府由石家庄迁入北平办公。不久，华北局也进入北平办公。古都北平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从延安撤出到晋绥边区临县，在中央城工部工作。十二月，调到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任副主席兼秘书长。不久，由于形势的发展，成立了华北局。少奇同志为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为第二书记，聂荣臻同志为第三书记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少奇同志主要负责党中央方面的工作，所以华北局的工作主要由薄一波同志负责。

华北局是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边区合并组成的。所属各机构均由两区原机构负责人分别担任正副职。例如宣传部长周扬，就是原晋察冀的宣传部长，副部长则是原晋冀鲁豫的宣传部长张磐石。组织部的正副部长刘澜涛、王从吾，也是这种情况。我原是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秘书长，被任命为华北局的秘书长，副秘书长为平杰三和周荣鑫。平是原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副秘书长，周是原晋察冀中央局的副秘书长。

天津解放时，因为我于二十年代曾在彼做过地下工作，熟悉当地情况，故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还没有到职，北平解放了，我随华北局进驻北平。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徐冰同志是副市长。徐冰同志到职后不久就病

了，又改任我为北平市副市长。所以，虽然这个时期在天津街头已经出现由市长黄敬、副市长张友渔署名的布告，实际上我并没有到职。调我到北平市工作，是因为我对北平比天津更熟悉，我同北平各阶层的联系比天津更多。调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同薄一波同志、叶剑英同志一道，在后圆恩寺华北局的会议室里对我谈的。关于这次谈话，我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一九四九年，大约四月末五月初的一个上午。当时华北局在地安门外后圆恩寺胡同的一所院内，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里曾是蒋介石的别墅。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都住在西山。为调我到北平市工作，恩来同志特从西山来到华北局。当我被叫到会议室时，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薄一波同志已经在那里。恩来同志首先简要地讲了北平市工作的重要性，说因为我曾在北平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对北平的情况很熟悉，所以要我到北平市工作，希望我把工作做好。在这以前，薄一波同志已经就这个问题跟我打过招呼。我这个人一向对党分配工作绝对接受，没有讲过条件，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恩来同志讲话后，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但不一定能做好，努力去做就是了。

记得叶剑英同志插话说：“你是室内的强者，室外工作还要下番功夫！”叶剑英同志的话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剑英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抗战时期在重庆时，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他对我很了解。他知道我在文字水平、知识面、组织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一些特点，也知道在我的历史经历中，虽长期做过学生运动工作，广泛接触过青年群众，但接触工农群众不多，缺乏这方面

的经验。在这两个方面，我和徐冰同志正好相反，他的长处正是我的不足，我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叶剑英同志对我的长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我的不足之处。所以我一直记住他的这句话。他对我很信任，使我受到很大鼓励。本来，市人民政府的党组书记应当由市长担任，他提出要我担任。恩来同志同意，就这样决定了。实际上，这个建议还不仅说明他对我的信任，也反映了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后来的工作证明，由于我担任负责常务的副市长，大量工作需要及时由党组研究决定，剑英同志的建议对于市府工作的进行是有好处的。

关于我的工作问题还有段小插曲，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在北平解放前夕，考虑到作为华北局的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要进入北平，想找一个对北平比较熟悉而又熟悉新闻业务的同志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同志曾向当时的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志提到我。当安子文同志找薄一波同志商量时，薄一波同志讲，由于当时华北局工作的需要，没有同意，改调了张磐石同志。

我接受任务后，交代了华北局秘书长的的工作，到北平市报到。先后见了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市长叶剑英同志。他们分别向我介绍了北平市的情况，谈了工作要求，我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走上了新的岗位。

北平（一九二八年北伐胜利前称北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自从我于一九二三年离开太原到北京上大学，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十五年间，除了几次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追捕，短时离开过北平外，我的整个青年和壮年时代都是在北平度过的。从学生到教授，从报社记者到总编辑、总主笔；从入党、

主办地下党的合法报纸，担任地下市委的领导工作、军委系统的特科工作，到负责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的领导工作，我一直在这里从事革命运动，进行革命斗争。领导过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做过新闻宣传工作，进行过上层文化界和其他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开展反封建统治、反法西斯统治的民主运动，推进抗日救国运动，我从实际生活实际斗争中，学得了比较多的解决政治、经济等方面实际问题的知识。经过了八年抗战、五年解放战争十二个春秋的风风雨雨，现在我重新回到北平，以新的身分担负起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古都、建设社会主义新首都的重要任务，争取让几百万父老兄弟姐妹从此过上安定幸福的新生活，我深感责任重大。

进城后不久，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我们党在河北省阜平县西柏坡村举行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确定党的工作中心必须由农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特别强调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城市的生产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这是一次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规定的新时期总路线总政策和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为我到北平市工作指出了明确方向。

不过，虽说我是五月九日到任的，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当我还在华北局工作时，就已经接触过北平市的工作了。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北平、天津等市都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

府直接领导。我当时给《人民日报》写了篇社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就是针对北平等城市的情况而写的。这篇社论的主要内容是说：现在的大城市从反革命的堡垒变为革命的堡垒，就要改变我们工作中先乡村后城市的做法，使城市起领导农村的作用，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发展城市的生产，并加强政治、文化、教育建设。

平津解放前夕，华北局曾根据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的精神，发布过《关于进入平津的政策与作风》的文件，主要内容包
括：一、实行军事管制制度；二、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三、关于战犯、反动分子、特务、俘虏官员和蒋傅（当时傅作义将军还没有接受和平改编）党政军警财经及其他团体一般工作人员的处理；四、关于蒋政府公有财产、四大家族财产、首要战犯财产及一般军阀官僚军政财经机关人员财产的处理；五、私人工商业的保护及私人银钱庄号的处理；六、关于蒋政府货币的处理；七、关于公私立学校及学生公费的处理；八、关于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处理；九、关于外国侨民、外国领事、教会、外国工商业、外国银行的处理；十、对待工人的立场、态度与政策；十一、救济城市贫民及难民问题；十二、进入平津后的宣传政策；十三、进入平津的干部应注意的几点。这个文件，是我以华北局秘书长的身分，遵照华北局领导同志的指示起草的。

在我起草的这份文件中还讲到，军管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北平市军管会是北平市的国家权力机关。市政府是军管会领导下的行政机关。军管的目的与任务是：

甲、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散兵游勇和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

乙、接受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
丙、恢复并维持正常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
丁、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他违禁品；
戊、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团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成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

己、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

庚、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监狱，建立物资的管制机关，建立临时的人民代表机关；

辛、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务分子及其他流氓投机分子所操纵），建立工会、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

壬、整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

这些任务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如果不在一定的时期内实行军事管制，就不可能肃清残余反动势力，巩固革命成果，安定社会秩序，有效地进行各项建设。当然，军管会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应当时需要带有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措施。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的变化，这些措施应当适应具体情况，有的继续采用，有的加以修改、补充或废止。例如宣布戒严，在逐步转入正常状态后，就不宜轻易采用，以免影响其他各项工作的进行；动辄断绝交通，会给人民带来工作和生活的不便。

关于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设想，是为了联系群众，

了解情况，广泛与各界交换意见，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当时工会等人民组织还在积极筹备中，不可能仓促成立。如无充分酝酿准备，混进了特务和坏人，反而脱离了真正的广大群众。是不是可以暂时采用召开座谈会或成立临时参议会的办法呢？这也考虑过。但前者不能解决经常性的问题，后者在成分上偏于社会上的上层分子，对群众联系不会很密切，所以也不能有效地达到我们的要求。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更不成熟。因此，便采取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办法。这个办法，既可以避免上述缺点，也可以做为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事实证明，这些考虑和采取的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做法是正确的。

文件中关于战犯、反动分子、特务、俘获官员和蒋傅的党政军警财经及其他团体一般工作人员的处理规定是：战犯、罪大恶极分子应逮捕惩处，一般工作人员不加逮捕；对一切俘获的反动官僚、特务分子，只留下有搜集情报作用的少数人，其余原则上一律向蒋区内放走，可以动摇蒋区人心。但对作恶甚多，为广大人民所痛恨，送走会失去人心的，则扣留惩办。旧警察必须放下武器，必须改造。但也考虑到像平津这样大城市的需要，规定了暂用其徒手服务的政策。对蒋政府财产和四大家族、特务分子以及上述其他各种人的财产处理，也都做了明确规定。

进城后，平津等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按照上述这些规定处理的。

从以上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事实上，早在我到北平市上任以前，我已经同北平市的工作有接触了。这是我到北平市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

我到任不久，市长叶剑英同志率军南征，市长改由平津卫戍

司令聂荣臻同志兼任。在华北局的时候，聂荣臻同志任第三书记兼华北军区司令员。我任华北局秘书长，在工作中经常接触，他对我也是信任的。因此，北平市政府的具体工作，基本上都由我负责处理，再向他们汇报。只有关于重大政策性问题和有关全局性的问题，他们才过问并给我指示。这就加重了我的责任感。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届一次会议上，因聂荣臻同志调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改选彭真同志为市长，我连任副市长，并选举代表民主党派的吴晗同志（当时还没有入党）为副市长。彭真同志是市委书记，并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对市政府工作也只能抓有关方针、政策和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具体工作仍是由我负全责，我还兼任市政法委员会主任、市劳动局局长，直接负责处理有关工人的工作。当时这方面的问題较多，责任较重。吴晗同志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后来，中间几经选举，又增加过几位副市长，分管财经、工交、市政建设等工作，我一直任专管常务的副市长，负责有关计划、预算、编制、人事及其他全面性、综合性的组织领导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调离为止。

在党内，我于一九四九年刚到北平市时，市委书记是彭真同志，副书记是李葆华同志，我是市委常委之一。后来我担任过市委副书记；设置书记处制度后，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刘仁同志任第二书记，我担任管政法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书记。此外，如前所述，我还担任市政府的党组书记，一直到取消政府党组制为止。

北平解放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段时间，北平市政府曾设在中南海。我当时就住在后来周总理住的西花厅。中央政府成立

后，与党中央领导机构同设在中南海。北平市政府迁至府右街南口、西长安街路北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旧址办公。我就住在机关里。后来，搬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甲一号住。这所房子原是内蒙土匪头子、大汉奸，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军长王英的公馆。我们进城后，没收了它。开始叶剑英同志曾和我一道住在这里。他搬走后，吴晗同志搬进来。后来吴晗同志搬走，薛子正同志和我住在这里，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被关进“牛棚”为止。

我和韩幽桐同志，虽说早在一九三三年地下工作时期就结了婚。但由于工作需要，常常天南海北，各在一方，相聚的时间很少。全国解放了，韩幽桐才由东北调回关内，先在天津担任教育局长，一九五〇年调到北京，在教育部工作。一九五二年华北人民法院成立，她担任副院长，由于工作忙碌，长期住在东城王大人胡同法院机关院内。我自己住在西城。一九五四年，大区撤销后，韩幽桐调到最高人民法院任民庭副庭长。没多久，又因她是回族人，于一九五八年调去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高级法院院长，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又调回北京任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她长期被隔离。

有的同志同我谈起，解放后，地位变了，我有些什么感受？说实在的，我没有感到我的生活有多大的不同。进城前工作忙，进了城，更忙。进城前是供给制；进了城，头几年还是供给制，还是吃小灶。人家做什么，我吃什么。饮食是这样。以后自己

然，不矫揉造作，除了早晨散散步外，不做打拳、练气功等其他活动，可以说唯一的运动是走路，能走就走，以步代车。我今年八十六、七了，视力、听力、记忆力和思考力都还正常，没有什么大病，每天仍然可以工作学习十几个小时。

二、接 管

北平，是全国第一个以和平方式解放的大城市，这在我们党的革命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面临很多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因而对北平接管工作处理得好坏，必然会对全国尚待解放的城市和已解放的城市，发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于当时北平的工作来说，既要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迅速肃清反动势力，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又要力求慎重稳妥，不犯错误，尤其是方针政策方面的错误。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又不能等学好了再干，要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先把北京市的行政区划介绍一下。

从解放前夜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调离北京市为止，北京的市界有过五次比较大的变动。

一九四八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入北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改称北京）时，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维持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电令划定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南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实行军事管制；同时成立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军事管制期间的权力机关，统一全市的军事、民政管理。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一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接管工作正式展开，军事管